

# 李光耀回忆录

经济腾飞路

1965—2000



外文出版社  
新加坡联合早报  
时代媒体(新)私人有限公司

# 经济腾飞路

## ——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 著

外文出版社

新加坡联合早报

时代媒体(新)私人有限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

李光耀著.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9

ISBN 7-119-01979-1

I. 经… II. 李… III. 李光耀—回忆录—1965~2

000 IV. K833.3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756 号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mailto: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mailto:sales@flp.com.cn)

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代媒体(新)私人有限公司  
联合授权外文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作 者 李光耀

责任编辑 曾惠杰

封面设计 蔡 荣

印刷监制 张国祥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社 址 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37

电 话 (010)68320579(总编室)  
(010)68329514/68327211(推广发行部)

印 刷 三河实验小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开 本 大 32 开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00001-30000 册 印 张 20.87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7-119-01979-1/I·707

定 价 2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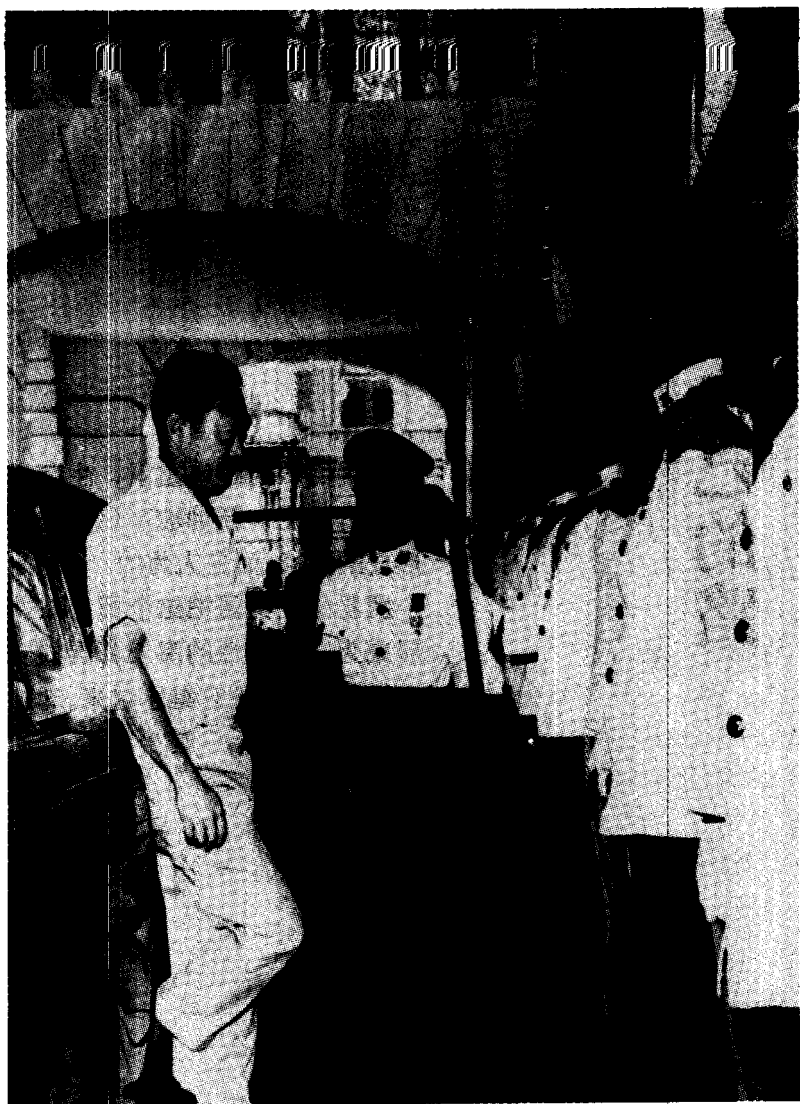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 走自己的路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同年12月8日我来到国会大厦，出席第一届国会的开幕典礼。

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的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活岛上的人民。

我从没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得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顾200万新加坡人民的生计。1959年我35岁的时候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是，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突然间，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使我更觉得沮丧的是，外国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殖民地撤出的情况跟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他指出，当古罗马军团撤走，外邦人接管后，古罗马帝国的法纪全垮了。丹尼斯·沃纳在《悉尼先驱晨报》（1965年8月10日）写道：“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它依然是行不通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65年8月22日）的理查·休斯说：“花费超过1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其实，我也有相同的忧虑，却没表露心中的感受。我的职责是维持士气，为人民点燃希望，而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念。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对新加坡的基地英国会保留或能保留多久。他们会不会因为新马分家的方式而缩短留下来的时间。威

尔逊首相已经面临后座议员的反对,对他们来说,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驻军的政策代价太大,不得人心。这个政策对工党政府争取选票毫无帮助,他们需要拨款作为福利和其他能赢得选票的用途。只有一个国家能保障东亚的安全和稳定,那就是美国,但是美国却在越南游击战争中泥足深陷,它的欧洲盟友和亚非政府都非常不喜欢这场战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美宣传在第三世界收效很大。我认为,新加坡要让美国继承英国所扮演的角色,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政治代价很大。单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又威望不够。

我担心的是,英国对本区域的影响会无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反之美国的影响将扩大。我们这一代在帝国时代成长,这样的改变不容易适应。少了英国扮演缓冲角色,我只能向美国势力妥协。英国人在行使他们的意志时,总还客客气气。美国人就不同。我可以从他们怎样对待越南南方领袖,甚至是那些处境没西贡那么糟的泰国和菲律宾领袖看出来。美国是个如日中天的强国,肌肉发达,惯于耀武扬威。

此外,我还有加强个人保安措施的累赘。这真是令人厌烦。分家后,负责保护我的警官曾经提醒我,马来西亚的马来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已把我视为最可恨的人。当时,这些报刊仍在新加坡发行,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新加坡也收听收看得到。后来,他又进一步劝我搬离欧思礼路的住家,直到他们改装好我的住家之后,才搬回去。保护我的保安人员人数也增加了,原本只有一个。他考虑得周到,也暗中保护芝和孩子们。种族狂热主义者所造成的威胁是防不胜防的,他们不像共产党人那样理智而深谋远虑。共产党人知道对付芝或我们的孩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和芝有三四个月暂住在樟宜别墅,那是一座靠海的政府度假屋,位于“受保护地区”范围内,附近是樟宜皇家空军基地。

那时我不定期地召开内阁会议，每次开车到政府大厦开会，会有一辆保安警卫车跟着，前面则有车队开路，交通因此受到干扰。在必须做紧急决策时，我会跟有关部长进行电话会议。这使我觉得以从没完没了的会议中抽身。由于我在度假屋办公，所以我的私人助理和我那忠心耿耿的内阁秘书黄水生，得天天到那里去。离度假屋不远是皇家空军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它让我在处理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记录的日子里，得以放松身心。我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有时跟一个朋友一起打，有时自个儿打。芝总是在一旁陪着我走来走去。

三个孩子还得上学，所以只好留在家中，忍受工人建筑一道状似蜂窝的围墙所造成的不便。建筑围墙是要把我们前门的门廊和公路隔开。在防弹玻璃还没运到以前，他们暂时用钢片封住窗口，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牢房里生活一样。几个月后，工人终于装上玻璃窗，我们全家才如释重负。当我回到欧思礼路住家时，已有辜加警察（英国人从尼泊尔招募来的）在站岗。我想，不论是华族警察向马来人开枪，或是马来警察向华人开枪，都会引起广泛的反响。而辜加警察是中立者，他们以绝对的纪律和忠诚著称。这一切安排令我倍觉不安，也凸显了建立一支军队来保护这个脆弱的独立国的迫切性。

我面对许多急务，首先是争取世界各国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包括加入联合国。我委任拉贾拉南（我们称他拉惹）为外交部长。他是个非常适合的人选。战前和战争时期他在伦敦求学就已经以反殖民主义著称，但却不是激进派。他友善、诚恳、温文尔雅，懂得在坚持立场和外交妥协之间，取得准确的平衡。不论在国内或在海外，后来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爱戴和尊敬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副总理杜进才和身为外交部长的拉惹，在1965年9月一起启程到联合国，坐上了新加坡的席



位。

我关心的第二件事是保卫国土。我们没有军队，两营新加坡军队是由一个马来西亚的准将指挥的。要怎么样才能很快地建立防卫力量，哪怕有多单薄？我们必须吓阻和预防吉隆坡的马来过激分子煽动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部队闹政变，剥夺我们的独立。吉隆坡的许多马来领袖都认为绝对不能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是应该狠狠地打击新加坡，一直到它屈服为止。如果东姑遭遇不测，敦拉扎克将出任首相，那些强硬的过激派领袖可能迫使敦拉扎克推翻东姑的决定。那真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时刻。

在全力应付这些主要事务的同时，我也得顾及迫在眉睫的治安问题。我们担心在获知已被马来西亚政府遗弃而再度成为少数族群时，亲巫统的马来人会失去理智，胡作非为。我们的警察多数是来自马来亚甘榜的马来人，如果要他们采取行动对付想重归马来西亚的马来暴徒，他们的忠心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两个营的军队，多数也是马来亚的马来人。

所以当我知道吴庆瑞愿意也渴望负起建设国防的重任时，我很宽慰，立刻委任他主管内政和国防事务，两者归入一个部门，称为内政兼国防部，英文简称 MID。这一来，吴庆瑞便能够动用警察部队，协助进行新兵的基本训练。（时至今日，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车牌号码，仍然冠以 MID 三个英文字母。）不过这一来使得财政部无人领导。我和庆瑞讨论后决定让林金山出掌财政部。林金山总是采取务实的态度来解决问题，更何况他能跟庆瑞融洽合作，这样，庆瑞就能在财政政策上随时贡献个人的意见。

## 最头痛的问题是经济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头痛的问题是经济：如何让人民得以维持生计？印尼正同我们对抗，贸易活动停止了。马来西亚人想利

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进出口商做生意。如今新加坡已不再是英国统治的广大地区的中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我们必须理出一些头绪，因为当时的失业率高达 14%，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我们还得让人民以跟英国统治时期大不相同的方式来谋生。过去，工人辛勤地在仓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干、白藤进行加工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备。但是，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进口来加工处理和分级了。由于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

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取代我们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人民（包括抱着怀疑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左倾人士在内）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袖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蹋了它。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天然港口，是我们有限的资产之一。为了能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需要这股政治力量。

另一份珍贵资产是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愿意学习。他们虽然分成了几个族群，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

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民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个社会变得刚强勇猛、冲劲十足，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是要如何进入这个市场，我当时并没有答案。没人要我们把英国人赶走，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本能使然。如今我们必须为 200 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非取得成功不可，否则惟一的生存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但是必须依照马来西亚的条件，像马六甲和檳城一样，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这个时期，我不断接到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写来，标明“立即处理”或是“紧急处理”的便条，其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关于有必要迅速建立军队的问题。可是，要怎样建军呢？

我睡不安枕。芝请医生给我配些镇静剂，但是我发觉在晚餐时喝点啤酒或葡萄酒，效果胜过镇静剂。当时我 40 出头，年纪轻，精力充沛。不论一天的工作多么辛苦繁忙，我总是在黄昏时分，花两个小时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打上 50 到 100 个球，并跟一两个朋友打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那时的我经常睡眠不足。有一天近中午时分，刚履任的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急需向我传达英政府的口信，我在家中躺在床上接见他，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他一定是向英国首相威尔逊汇报了这个情况，因为威尔逊向我表示了他的关心。我在 1965 年 8 月 23 日回信说：“请别为新加坡担心。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刻，我和同僚们都会保持冷静和理智。在政治棋盘上举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们会衡量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具有战斗的决心和确保生存的条件。”

1965 年 8 月 9 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

## 2

# 好男要当兵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队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我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1000人，由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700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300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

我估量了一下形势，得到的结论是，东姑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我从政府大厦的总理公署到国会大厦，是由马来西亚军队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的。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1966年2月1日星期二，下午四点左右，吴庆瑞忽然到我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我报告一个坏消息：毗邻珊顿道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军训站发生暴乱。他发现最近入伍的各个部队的新兵当中，有80%是马来人，这使他惊讶，所以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和训练工作，并冻结所有的职位。军队司令误解了他的意思，擅自指示华族少校解雇所有的马来新兵。这名少校让所有的人到操场集合，叫非马来族士兵离队，随后通知马来新兵他们被解雇了。那些马来新兵对自己遭受的种族歧视，一时之间瞠目结舌。当他们从错愕中回过神来时，场面开始混乱。他们用棍棒和汽水瓶攻击非马来人，烧毁两辆电单车，破坏了一辆史古打，掀翻了一辆小货车。一辆警察巡逻车闻

讯赶到，马来新兵向它扔出无数的玻璃瓶，巡逻车无法越过翻覆了的小货车。一辆消防车随后来，也同样受到攻击。

珊顿道沿路聚集了大批看热闹的人群。附近工艺学院的学生离开课堂，拥上阳台和屋顶，居高临下，观看这场混战。下午2点45分左右，镇暴队队员乘坐镇暴车来到现场，发射催泪弹。接着，受过特别训练的镇暴警察出动，逮捕暴乱者，把他们押上囚车，载到对面的刑事侦查局大厦。暴乱者被扣留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里等候发落，看看是要把他们控上法庭，不准他们保释，还是准他们保外。

吴庆瑞担心让他们保释的话，他们回到芽笼士乃和其他马来人居住地区，散播他们如何遭解雇的消息，那可能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触发暴乱。我立即请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到我的办公室来，把这件棘手的事情告诉他。由于当时新加坡警察和军队几乎全是马来人，会同情暴乱者，我要求罗布通知英军司令待命，以防种族暴乱失控。我告诉他，我准备到刑事侦查局亲自处理这件事。要是认为情势可以缓和下来，我会让这些人的家，否则也许要在提控他们后加以拘留。这一来，当天晚上365个家庭将会等不到他们的儿子回家，有关马来人受到压迫的谣言将会传遍新加坡。

罗布表示他会据实通报，但是也谨慎地指出，英国军队不能干预内部安全问题。我告诉他，总司令或新加坡驻军总管应确保英军至少能防止暴乱者失控，以免他们像1950年在一次涉及一名荷兰少女的宗教暴乱中那样转而对付白人的事件重演。

接着，我召见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渥，讨论应该如何处理那些人，看看我的做法是否行得通，并请他陪同吴庆瑞和我到刑事侦查局去会见暴乱者。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里，我通过一个手提扬声器用马来语向新兵讲话。我告诉他们，命令规定只招募

新加坡公民，少校误会了，以为不要马来人，实际上新加坡的马来公民都有资格应征。被认明是暴乱领袖的十个人会被扣留，由警方提控，其余的人可以回家，回家后不得散播谣言。回家的人如果事后被查出参加了暴乱，也会被控告。我也说，所有新加坡公民第二天必须回营报到，接受正规训练，只有新加坡公民才有资格应征；不是新加坡公民的，只好到马来西亚去寻找工作机会。有工作的前景使他们向我鼓掌欢呼。我必须当场做出决定，认定风险最小的选择是扣留少数头头儿，加以惩罚，让多数人回家，希望答应给他们工作，他们会守规矩。

过后我会见记者们，要求他们在发布报道时婉转些，尤其是马来文报。记者们做到了，第二天早上我读报时松了口气。后来14人被控以暴乱罪名，不过总检察长最终认定最好是撤销控状。这次事件确实提醒了政府，必须以最敏感的方式处理种族事务。

1967年11月，马来半岛的一个市镇北海和对岸的檳城发生华巫冲突，我们再次陷入紧张状态。分家后种族关系迅速恶化。在马来西亚，华人对他们政府的马来语政策感到不满、愤怒，情绪越来越高涨。我们担心马来半岛会发生种族暴乱并蔓延到新加坡来，所以成立了一个以吴庆瑞为主席的部长级委员会，由警察部队和军队的高级官员担任委员，制订应急措施。

英镑贬值之后，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坚持即使找换零钱，价值贬了14%的英国旧硬币，在兑换成马来西亚新硬币时，也得加以调整。这导致各地发生零散的罢市行动，工人罢工抗议，继而引发了种族冲突。乡村地区的华人纷纷迁移到市镇。我们担心万一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许多市镇将发生暴乱，涉及的范围太广，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将穷于应付。

## 迅速建立装甲部队

由于担心这些暴乱会蔓延到新加坡来，我们不得不迅速建立装甲部队。1968年1月，以色列要更换军备而减价出售法国制造的AMX-13轻型坦克，新加坡决定购买。到1969年6月，30辆经过整修的坦克运到，同年9月又来了42辆。我们也买了170辆V200型四轮装甲车。

英国人没提出要像50年代协助马来亚那样协助我们建立一支军队。他们曾经在幕后努力，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为新加坡争取平等的待遇，却引起马来亚的不悦。如今他们必须应付的马来亚，不仅是对他们有点不悦而已。他们也必定猜到，提名新加坡加入联合国和共和联邦的马来亚已打好算盘，有意成为新加坡的军事教官，以确保我们对防务的认识不会胜过他们。

我们必须收回两营军队，恢复它们的新加坡身分，确保它们忠于新加坡。当时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在新加坡独立后，立即表示愿意出任国防部长。任务很艰巨，我们得从头做起，他却愿意挑起这副担子。当时他的全部军事知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来的。英军在1942年2月投降之前，他担任过新加坡义勇军的中士。我叫他着手进行。吴庆瑞跟以色列驻曼谷大使莫迪凯·基德伦接触，要求帮助。他是在几次到曼谷出席会议时结识基德伦的。8月9日分家几天后，基德伦从曼谷飞来新加坡，提出了一些有关协助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吴庆瑞带他来见我。1962到1963年间，基德伦曾经几次见过我，要求我允许以色列政府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他向我保证东姑已经同意了，我们不必等到马来西亚成立后才做决定。我告诉他，既然东姑同意了，领事馆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设立不会有问题，但是在马来西亚成立





英军撤退后，新加坡于60年代末实施国民服役制度，自行负起防务责任。这是我早年同丹戎巴葛区入伍青年的合影。

之前设立，肯定会使基层马来穆斯林情绪激动，以致发生争端，打乱我的合并计划。他非常失望。不出所料，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没允许以色列开设领事馆，事实上也无法允许。

我听了基德伦有关军事训练的建议，但是要吴庆瑞暂时按兵不动，因为我寄出了两封信，一封给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另一封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统纳塞尔，要求他们提供紧急援助，协助我们建立武装部队。我要等他们的回信。

在给夏斯特里的信中，我要求他派一名军事顾问前来新加坡，协助我们建立五营军队。两天后他回信说：“真诚地祝愿新加坡人民幸福和繁荣。”对我的要求，他只字不提。纳塞尔总统回信承认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跟夏斯特里总理一样，对我要求他派遣一个海军顾问前来协助新加坡建立海岸防卫力量的事，也避而不谈。我原来也曾预料印度政府会小心翼翼，不想被